

开埠通商与津冀 社会变迁

徐永志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

徐永志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徐永志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 8

ISBN7-81056-451-X

I. 开… II. 徐… III. ①通商口岸-关系-社会变迁-天津市②通商口岸-关系-社会变迁-河北省 IV. K. 29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8215 号

书 名	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
作 者	徐永志
责任编辑	张 山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者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1056-451-X/K · 46
定 价	25.00 元(精)

作者简介

徐永志，男，1962 年生于河北井陉。1982 年在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 年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8 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系副主任，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师从王锺翰教授。长期从事晚清社会史的研究，参撰或参校有《中国大通史·晚清卷》（副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张之洞集》等书，在《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序

陈振江

通商口岸及其腹地社会转型研究，既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也是地域史研究的一种特殊的类型。这项研究实质上是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模式、途径、内容与特点，以及通商口岸在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程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社会近代化运动（即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是从通商口岸开始的，并由通商口岸向其腹地城乡城镇辐射，进而连续不断地向通商口岸及其腹地以外的广阔内地传播和发展。近代中国上百个通商口岸及其面积大小不等的腹地纵横交错，形成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干线和“网络”，推动中国社会波浪式地向近代转型。一般说来，通商口岸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基地和桥头堡，但同时也是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和产生中国本土化的近代文明的摇篮和基地。通商口岸的产生和近代文明的传播，在客观上打破了中国社会长期封闭的状态，促进了同世界的交往，并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本土化近代文明的产生。诚然，中国社会早就孕育着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一个个通商口岸的开辟，中国也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但在中国近代前期，自然经济犹如汪洋大海，处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仅仅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孤岛。如果仅靠这些星星点点的“孤岛”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知还得熬过多少个世纪才能使这些斑斓似的假设变成合乎历史发展的而又梦幻般的现实。

然而，严酷的历史实际却是西方资本主义频频入侵而迅速改变了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轨道，把中国卷入到世界资本主

义旋涡和近代文明中来，迫使中国由被动地接受到主动地认同和积极地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文明。因此，有关通商口岸及其腹地社会转型的研究，是一项牵动中国近代历史全局性的重大而复杂的研究课题，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所以，自 1990 年起，我把“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研究”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并先后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共同从事这项课题的系列性的研究。徐永志同志是这个研究方向的第一批博士生。他一马当先，经过三年的刻苦钻研，率先完成了关于北方开埠最早、规模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及其腹地直隶（今河北省）农村社会的转型研究，撰成以《天津开埠与津冀社会变迁》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于 1998 年 6 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现又得到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专项基金的资助，予以出版问世。这不但是对徐永志博士的极大支持，也是对勇于开拓新领域的研究者的支持和鼓励！

的确，徐永志博士的这部著作是一部选题新颖、内容宏富和多所创新的力作。他抓准了这项研究课题的实质和重点，特别是他对国内外研究与此相关的论著和调查资料比较熟悉，而使自己的研究立足于坚实的理论与史料基础之上，故能左右逢源、思路开阔，而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提出并充分论证不少有价值的新见解。例如，他把天津开埠通商对津冀社会变迁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和多元因素作了深入系统的综合考察，并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天津开埠对津冀社会发展趋向的影响，进而通过对津冀政治中心的迁移、城乡通商贸易和早期工业化运动等重要环节的具体分析，深刻揭示了津冀社会在发展近代工业文明的带动下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积极因素和特点，颇有说服力。总之，这部著作是对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有益探索和贡献，值得一读。是为序。

庚辰仲夏于南开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学术史的回顾.....	(2)
三、本书的基本思路与分析构架.....	(10)
第二章 前近代时期的津冀社会	(13)
一、明清政府对天津的开发经营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13)
二、明清时代冀地的社会与经济状况.....	(21)
三、松散的经济联系.....	(26)
第三章 开放、早期近代化和城乡关系的转型	(29)
一、天津开埠与津冀政治中心的迁移.....	(29)
二、通商贸易与津冀社会经济联系的空前增强.....	(36)
三、早期工业化运动中津冀社会的互促共进.....	(58)
四、小结.....	(74)
第四章 开埠通商的扩大化、新政及津冀社会联系网络的扩张	(76)
一、庚子剧变后外国侵略势力在津冀地区的扩张.....	(76)
二、北洋新政——津冀社会的重建与双元整合.....	(86)
三、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	(124)
四、新型城市网的初步形成.....	(132)
第五章 城乡贸易增长与社会变迁	(142)
一、商品流通概观.....	(142)
二、农村经济的新陈代谢.....	(157)

三、承递与新变——天津区域性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的初步形成·····	(191)
四、小结·····	(206)
第六章 结语——津冀模式的总结·····	(208)
主要引用及参考文献·····	(214)
英文提要·····	(222)
后记·····	(224)

第一章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与乡村是人们聚居生活的地域空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说过，一个国家就有两块，一曰城市，一曰农村^①。列宁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②。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城乡分离及其对立与统一的运动“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③。这一运动在古代表现为“城市乡村化”，在近代则是城市近代化和“乡村城市化”^④。

上述规律与现象在津冀城乡一隅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表现得颇为充分。地处黄河下游的津冀地区，是我国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尤其是自金朝于金贞元年（1153 年）奠都北京后，中经元明清三代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 年），它更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不但一直踞为畿辅要地，而且还发育增长为近代北中国经济的核心腹里。其发展转型速度之快，地位升级之高，影响之既深且广，仅在上海及其周围农村腹地之下，堪为中国城乡发展史上的一个典例。

纵观津冀这 800 余年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一揽子变化，亦即其社会文明形态和区域地位的突变，实肇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天津开埠，约成型于 20 世纪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5 卷，第 33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26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7 页。

④ 同上第 46 卷（上），第 480 页。

初的前 10 多年间。此前，尽管津冀社会内部已孕育出引人注目的新的文明因素，但从总体上看，它仍为一个各地习见的传统农业文明“小区”，社会发展相当迟滞落后，并且彼此之间尚无明显的社会分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①，即反映了这种城乡经济的同一性和社会分工的落后性。然而，际此时期，城乡急剧嬗变，紧紧相系，数十年的风云变迁，超越了既往数千年的层层累积，并显示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从而成为津冀历史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一环。

那么，津冀社会在这新一轮发展周期的具体状貌如何？内外促动因素何者居首？城乡间的“相系”关系是如何建构并相互影响的？津冀社会的变迁呈现出哪些特征？它还有哪些“作为特写而进行研究的意义”呢？这些，都是本书所要着力集中研讨的问题。

二、学术史的回顾

由于津冀城乡是窥探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窗口，故而对它的记叙与研究向来为中外学者甚或官方及其他人士所关注。早在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日本为掌握天津“实态”，扩张其侵略势力，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由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出面，纠集一批“中国通”式的日本学者、来华官员等着手编写具有情报资料性质的天津地方史书，并于 5 年后题以《天津志》（今译为《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在日本出版发行。内容涉及天津的地理环境、建置沿革、人口、市政工程、交通运输、宗教、教育、军队、金融、工商业、内外贸易、医疗卫生以及居民社会生活状况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义和团运动后天津的变化概貌，并开了以后日本大规模调查与研究华北地方历史与现状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480 页。

的先例。与此差相同时，英国在华领事馆、海关和租界当局也组织人员编撰了一本名为《20 世纪香港、上海和其它中国口岸的印象》(*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的官方商埠志书，于 1908 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其中，该书以相当的篇幅记叙了天津的历史、政治、人口、商业、工业与自然资源等，毫不掩饰地称包括天津在内的中国各通商口岸有“联系（大英）王国统治下各部分的纽带的价值”^①。时隔 18 年后，英国博士雷穆森 (O. D. Rasmussen) 根据其在津埠约 20 余年的经历，撰写了一本《天津——插图本史纲》(*Tientsin: 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是书起自天津开埠迄于民国十三年 (1924 年)，主要介绍了天津的历史沿革，列强在津攫取租界，设立殖民组织机构与社会团体，开办洋行，镇压义和团，以及其它文化、教育、卫生和生活娱乐活动等，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而它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是一部完整的天津史。民国十年至十四年 (1921—1925 年)，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主任美国人卜凯 (J. L. Buck) 带领该系部分学生对河北等 7 省 17 县 2886 户农家进行经济与社会调查，其最终成果结为《河北盐山县 150 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中国农家经济》出版。此时，由于在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形日益严重，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方兴未艾，争执不下，需要社会实证作理论依据，加之盛行一时的西方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和调查方法已相继传入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因而一些高等学府、民间学术团体、官方与半官方机构和个人等纷纷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普查，合力掀起一股空前规模的城乡社会调查热潮。津冀得风气之先，以致有关该地域的社

① Wright, Arnold,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P.10, London, 1908, 以下简称为“Treaty ports”。

会调查较之其它地区更为广泛、深入和细致。据笔者目前所知，迄止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计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先后改称南开经济学院、南开经济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天津市社会局、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等 6 家机构、学校以及个别学者分别对定县、天津、高阳、宝坻、清苑^①等市县进行了重点调查，先后出版的代表性成果有：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以上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方显廷《天津针织工业》、《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华北农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与毕相辉合作），冯华年《天津手工艺工人家庭生活调查之分析》（以上为南开大学），张培刚《清苑农家经济》（中央研究院）、刘大钧《天津铁路工人生活程度的研究》（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吴瓿《天津市纺纱业调查报告》、《天津火柴业调查报告》、（天津市社会局），林颂河《塘沽工人调查》等。嗣后，新民学会中央指导部于抗战后组织力量到冀东一带进行调查，发表了《乐亭县事情》、《河北省滦县及唐山市事情》、《河北省丰润县事情》等成果。此外，从民国十七年（1928 年）起，卜凯又进行了一轮长达 9 年的全国农村社会调查，编出《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内中也涉及到冀地。

继 20 世纪初年的天津社会调查后，日本在华侵略机构又开始操持起长期性、大规模的华北农村调查，重点是冀东。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日本通过与南京政府签订的《塘沽协定》，强行划出冀东 22 个县为所谓的“非武装区”。接着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3 月由日本侵华驻屯军司令部主持，拼凑了一个“冀

① 按：[美]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1986 年中译本第 37 页误将“清苑”译为“清远”，考虑该书影响广泛，兹特指出，以免讹传。

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筹划实施华北农村调查计划。同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15 日，调查班出动 33 人，分成 14 个组，开赴冀东农村各县实地搜集 25 个村庄的社会经济情报。他们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农村一般调查”包括 55 个项目 100 多个有关农村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以农户为单位的“农家调查”包括 26 个专题调查表和数百个调查项目，其中像人口、家庭、租佃、地价等情况，可以上溯百数十年，颇为详尽深入。这次调查的资料被编为《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出版，共 4 册。

翌年初，半官方的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天津事务所积极担负起继续调查的任务，选择丰润的米厂、昌黎的前梁各庄等 4 个县的 4 个自然村进行了为期 1 个月的典型调查，编成《第二次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3 册。“七·七”事变后，他们又在丰润米厂、获鹿马村等地作了实态调查，其中对米厂村的调查一直持续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分别出版了调查报告。此外，日本的“华北综合调查所”及个别日本学者还对石门（今石家庄市）近郊、保定近郊、邢台县农村作了调查。

日本对冀地进行的第三次大型农村调查是纳入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满铁组织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计划中进行的。与此前相比，这次调查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科学化，即该项调查系在东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弘严太郎（？—1951）所建立的“法律社会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参加者也大多为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高级学者，从而能自始至终地贯彻统一的学术规范，保证质量。其二，侧重社会生活调查。如该调查计划名称所示，此番调查特别强调要“掌握中国农民实际生活中的社会习俗，了解活生生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①，故所拟调查细目多涉及农家的人口、家庭、宗族、物质生活、营生习惯、社会风俗

① [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 1 卷，第 1 页。东京岩波书店 1981 年。

等，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农村社会习俗调查模式。预定的调查范围囊括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的冀、鲁、晋、绥、察地方及江浙等广大地区，但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本战败投降前夕，仅在河北昌黎与栾城、京郊顺义、良乡及山东恩县、历城等6县得到了实施，便草草收场。其调查结果，于50年代在东京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题，分六大卷陆续出版，约700万言。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李洛之、聂汤谷在从事接收日本侵华物资的过程中，因发现日本原在津的各侵华机构都收藏有诸多有关天津与华北的经济资料，遂“博访周咨”，穷3年之功，编撰成80万字的《天津经济地位》一书。该书引用丰富的文献与统计资料，详尽探讨了日本侵华前后天津工业、商业、金融、外贸、交通、通讯等各产业部门的变动情况，兼及天津与国内外的经济联系，阐述了“天津在（华北）经济上的重要性”^①，为近现代天津地方史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弥足珍贵。

进入50年代后，王怀远发表了《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一文，从列强在津开设洋行、对外贸易额、进出口商品结构等方面大致勾勒了从《天津条约》签订到抗日战争前的天津对外贸易发展概貌；鲍觉民探讨了天津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历程；郭士浩以启新洋灰公司为例，论述了近代中国水泥工业的资本集中问题。60年代至70年代末的论著则较多地记叙了津冀地区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②。

近20多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津冀地域分区史的研究日益兴盛起来，涌现出不少通史、断代史和专题研究的佳制，

① 李洛之、聂汤谷编著：《天津的经济地位》，民国三十七年印本，第2页。

② 以上请分别参见《北国春秋》、《南开大学学报》、《经济研究》、《历史教学》，限于篇幅，恕不一一标明出处。

有关的新史料也不断被发掘和利用。特别是对于天津城市近代化和华北农村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研究更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其中，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1993）和从翰香及其合作者们撰写的《近代冀鲁豫乡村》（1995），都是涉及上述研究领域的力作。

在美国，关于近代津冀地方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黄宗智(Philip Huang)在其《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利用满铁资料和他个人对华北两个村庄的实地调查，着重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民的土地占有状况、租佃关系、经营方式、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商品化，以及国家与乡土社会的关系。但作者努力的结果，是认为商品化导致华北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强化，而非趋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即“过密型商品化”，“并没有引起小农经济基本性质的变化。”^①他在随后的姊妹篇——《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也坚持了这一观点，这显然还是从中国农村经济长期停滞方面立论的，和侯继明(How Chi-Ming)、墨菲(Rhoads Murphey)等人所持议的近代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冲击主要限于通商口岸，而对农村经济影响极微云云^②，并无二致。与此稍有不同，马若孟(Ramon Myers)在对清末民国(1870年—1949年)冀鲁农村经济作了一番纵向考察后，认为华北土地分配状况没有进一步恶化，农民能够抓住内外贸易扩展给农村商品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发展带来的机遇，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及家庭主辅劳动力在耕与织方面的配

① [美] 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5年中译本，第124页。

② 参见 How Chi-M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Rhoads Murphey: 《通商口岸与中国现代化：走错了哪一步》，参见罗荣渠等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8—115页。

置,改善生活水平^①。令人称道的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积极倡导借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并在所著《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率先进行尝试,为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他在详细论述了20世纪前半期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渠道来深入乡村社会后,进而指出,始于清末新政的国家权力的扩张到40年代时改变了华北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及社会联系,并建构起一个包括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以及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的“权力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从而在基层社会确立了政府的权威^②。甘布尔(Sidney Gamble)的《华北村庄:1933年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North China Village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贺萧(Gail Hershatter)的《天津的工人,1900—1949》(*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也都与本课题的研究颇有关涉。

如前所述,日本对津冀地方史的研究早有基础,近一些年来,部分日本学者本着批判地利用历史“遗产”的见解,着重展开了以实证为特色的津冀史研究,目前已取得的成果主要有渡边惇的《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企业活动》、内山雅生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与中国史研究》、吉田浩一的《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地方市场结构与棉花流通系统》、足立启二的《清代的华北农业经营与社会结构》等等。在日本天津史研究会成立会上,顾琳(Linda Grove)曾就天津的经济地位阐发了有影响

① Ramon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70-1949*. Harvard University. 1970, PP. 123, 288.

② [美]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第4页。

的意见^①。

以上是中外近百年来关于近代津冀史研究的有代表性或主要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第一，1949 年以前的研究侧重于历史与社会调查，成果多集中于资料的收集与初步梳理方面，有的甚至是史实或统计数字的简单堆积与罗列，很难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研究。嗣后，主要是 80 年代以降，在前一段的基础上，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并日益朝专深化方向发展，显示出凑合成一个地方学学派的走向。第二，尽管截至目前的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从总体上看仍存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主要表现是：（1）论者大都局限于一地一人或一事的单体研究，很少从普遍联系的角度进行宏观把握，以致城市史与农村史自成壁垒，互不融通，这肯定不利于较深入地了解研究客体的外部形态和内在本质，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2）由上述，像城乡贸易、区域政治体制、市场系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等等，自然就会被人们割裂或忽略掉，成为城市史和农村史研究的共同的“视野盲区”。（3）既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具体性的论述多，综合性的论述少；在具体性的论述中，研究政治、经济和历史人物方面问题的多，研究文化、社会方面问题的少；在研究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中，以研究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则相对较少；在研究清末民初的经济问题中，一般描述性的文字多，量化的比较与分析少。凡兹种种，说明在近代津冀史研究的一些细部乃至宏观方面仍有继续拓展的余地，许多认识随之亦有待于进一步澄清、辨析或更新。这也是笔者为何选择此题进行研究的又一重要原因所在。

^① 参见《东洋史学论集》、《历史学研究》、《史林》、《东洋史研究》、《城市史研究》等期刊。